

刘品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策划人，也是《梁祝》团队协作的主要领导人。
没有刘品，就不会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化蝶

一位中国音乐教育家的人生评品

主编 ◎ 烁渊

中西書局

刘品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策划人。
也是《梁祝》团队协作的主要领导人。
没有刘品，就不会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化蝶

一位中国音乐教育家的人生评品

主 编 ◎ 烁 淵

中 西 書 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化蝶：一位中国音乐教育家的人生评品 / 烨渊主编。
-- 上海 : 中西书局, 2012.6
ISBN 978-7-5475-0394-2

I. ①化… II. ①燨… III. ①刘品 (1930~2008)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0700号

化 蝶

一位中国音乐教育家的人生评品

主 编 燨 渊

责任编辑 郭燕红 周春梅

编 辑 顾 蓉 张 雷

美术总监 王震坤

书法题辞 管继平

装帧设计 张 琯

责任校对 李京林

创意制作 上海燨渊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www.shwenyi.com)

中 西 书 局 (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 (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394-2 / K · 076

定 价 58.00元

我是农民的儿子，
能够成为现在这样的知识分子
是很幸运的。
我很满足！

1971.8.1



何占豪少鞠了两个躬

烁 涵

盛大的节日

2009年5月，对于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来说，无疑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先是北京国家大剧院隆重举行《梁祝》专题音乐会；紧接着，在人民大会堂，《梁祝》的作者登台接受全场致敬。几代蜚声海内外的小提琴演奏家轮番拉响优雅、柔美的《梁祝》。

两位作者回到《梁祝》“产地”上海之后，那一个夜晚，辉煌的上海大剧院喜气洋洋，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50周年庆生的晚会高潮迭起。持续回响半个世纪的器乐作品，或者说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六十余年内，中国人自己创作、国民百听不厌、在海外也有回响、生命力极其强盛的中华牌交响乐作品屈指可数。

曾几何时，中国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人倒霉还不算，作品也倒霉，经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艺术“常青树”少之又少。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应该是这“少之又少”中的佼佼者。

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风车》讲述了“文革”年代的一个人生故事。《风车》中的何爽，一个爱美的姑娘就因为厌恶清一色的黄军装，爱穿花裙，爱打扮，遭受社会的嫌弃。其中有一个这样的情节，令

今天的年轻人觉得不可思议：何爽在深更半夜关紧门窗，打开留声机，《梁祝》协奏曲轻轻回荡在深沉的夜色中，激荡着一颗少女纯真的心。那个年代，“黑云压城城欲摧”，听《梁祝》要关紧门窗。尽管《梁祝》被打成“宣扬封资修的大毒草”，被禁锢，可是真正的艺术经典，是那样地坚不可摧。何爽是《风车》中的一个艺术典型，美的化身。她难逃厄运，惨遭毁灭。在冤情大白的时候，梁尘抱起留声机冲出家门，跑到何爽墓前，《梁祝》的旋律再次响起，那已不是在黑夜中，而是在灿烂的阳光下。经受苦难磨炼，依然生机勃发，这就是艺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必须经受的浪沙淘尽始成金。

曾经是个谜

《梁祝》协奏曲历经50年风雨沧桑，已荣获“中华世纪经典”美誉，受之无愧！自然，作者也一荣俱荣。何占豪和陈钢，因为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期间创作《梁祝》，凭此成为“传奇人物”，早被列入中国音乐史册。一部如此享誉海内外的传世之作，居然出自两个青年学生之手，真是了得！

然而，两个学子何因大器早成？在我心里曾经是个谜。

就在上海大剧院为《梁祝》50年庆生的晚会上，有一位长者孟波被请上舞台，何占豪随后健步登台，走到孟波面前，毕恭毕敬，90度深深一鞠躬，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可见，出席晚会的各路嘉宾对何占豪这一鞠躬的含义似乎是理解的，所以才有回响。

此刻，我内心激动之余，不禁泛起阵阵遗憾的涟漪。

何占豪可算是我的老朋友了。1978年底，“文革”之后，上海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我与何占豪同在市政协恢复后的第五届文学艺术界组。他是音乐家代表，我是工人作者代表，当时我是上海港一个装卸作业区的装卸工。我与何占豪所在的小组主要成员是作家、电影家、音

乐家代表，就我一个工人作者“独养儿子”。巴金先生、王西彦先生、孔罗荪先生、贺绿汀先生、吴乐懿先生、桑桐先生与金焰、秦怡、王丹凤、黄宗英等电影明星都在同组。初进政协，于我来说，犹如走进一座中国文学艺术的浩瀚宝库。

那时的政协会议会期一般都是近十天（现在一般都在七八天）。每天上午九点开会，下午五点半左右结束，晚上还有招待电影等文娱活动，中午要休息两三个小时，年长的老委员都被小车接回家，睡一觉，下午再来开会。我与何占豪中午都不回家，就在小组会议室里攀谈起来。占豪兄就我追问“《梁祝》是怎么写出来的”讲起了他漫长的人生经历，从他的出生地浙江何佳山村说起，一直说到“文革”结束。准确地讲，他交给了我一份人生年表。在政协会议期间的一个又一个中午，听他连续的人生讲述，犹如欣赏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电视连续剧。我的两本笔记本上满满记载了他的艰辛与荣耀，也实录了《梁祝》创作的前因后果以及他幸得高人指点的无比荣幸。

以后，为了完成一篇关于《梁祝》的特写，我专访了孟波、陈钢、俞丽拿等有关人员。那时，何占豪与其他几位的讲述，毫不矛盾，只是互相补充，互相推崇，在充满友好的气氛中，《梁祝》形成的全过程逐步精细、丰富、完整、动人，多种视角勾勒出一个接近于事件本来面目文化记忆，这都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了。

据说，何占豪与陈钢两位在《梁祝》作品形成过程中，究竟谁的作用大，说法不一。依我看，这个问题无从考量，也没有必要考量，就像一个新生儿问世，究竟是父亲重要还是母亲重要无从考量一样，应该两者都重要，缺一不可。《梁祝》之所以成功，是何占豪与陈钢合作的成功，不能说其中哪一个更重要。

然而，就《梁祝》作品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看，何占豪介入得比陈钢更早。那时，陈钢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何占豪是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学生。那个时候创建的“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就在管



1978年，作者与何占豪（左二、左一）。从右起：桑桐、王云阶、刘如曾、吴登跳、陈传煦、黄歌



弦系，何占豪与丁芷诺、俞丽拿、沈西蒂等同学都在同系同班，自然结合，都比陈钢更早投身于为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音乐的艺术探索之中。何占豪在同班同学当中，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是较差的（这是他自己承认的），之所以成为“西为中用”艺术实践的领头者，是因为他在入院前长期从事越剧乐队的伴奏。他积累了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矿藏，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以后，从乐器到乐谱都是“洋”的环境，产生了出自本能的不适应，进而不可遏制地倾吐自己的艺术积累成为一种必然。《梁祝》协奏曲因何占豪的偶然一次艺术喷发成为一种创作的原始动因，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学生，一个非作曲专业的学生，盲目的欲望与自觉的追随之间的严格区别在于：前者凭个人喜好，缺少明确的目标与持久的力量；后者应是有明确的目标与追随过程中坚持不懈的努力。《梁祝》的成功就在于个人的喜好扩容为一个团队的共同追求，目标也同时放大到为中华民族艺术走向世界。创作《梁祝》的艺术目标的确立及其探索团队的形成，是作品成功的关键。而正是保证《梁祝》创作成

功的一位关键人物刘品，在上海大剧院《梁祝》庆生50周年的舞台上却没有出现，他完全有资格站在这个璀璨的舞台上，接受何占豪一鞠躬。

可叹的是，他已经永远失去了接受学子顶礼膜拜的可能。在2008年10月29日上午10时40分，他离开了人世，轻轻地走了。我们绝大多数《梁祝》的知音，就像过去根本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一样，现在也并未感觉到他的消逝。

公正来得太晚

诚如上海音乐学院前院长杨立青先生对刘品的终极评价：“《梁祝》的诞生，倾注了他的思想和智慧。他力主创建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由此而酝酿产生了《梁祝》的创作题材与创作班子。他亲自策划、组织，排除众多的困难，最终圆满完成了《梁祝》的创作。刘品同志在这首享誉中外的音乐作品诞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国音乐史上，将永远铭记这一史实。”

杨院长对刘品的中肯评价，让我看到了上海音乐学院领导的政治



作者（前排左一）
在1978年12月上海市第五届政协一次大会期间与文艺界组委员在一起。前排右起：孙泰、万籁鸣、鲁韧、祝希娟、王丹凤、傅全香、余红仙、曹秀文、茅惠芳、石筱英；二排右二起：贺绿汀、钟望阳、沈迈士、张乐平、王西彦、唐云、顾廷龙、师陀等

清明。

1981年上半年，应《解放日报》之约，我写了一篇展现《梁祝》创作过程中党的领导干部引领作用的长篇通讯《春风拂面彩蝶飞》。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一些可笑的政治做派依旧。那时，作者发表作品必须经过作者单位与作品涉及人物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审核、盖章同意。我拿着拙作的小样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办公室，审核的结果是：不同意发表。如果一定要发表，文中党组织负责人的名号不准出现。其原因至今不明。其实，所谓的单位党组织也就是由那么几个人组成的一个集体，他们的政策水准与胸怀往往决定其他人与事的命运。然而，他们不是神，政策水准有高低，胸怀有宽窄，所作的决定有时有失公允在所难免，但是却是一定要服从的，不管对不对。于是，那篇通讯见报时，“见事不见人”，刘品的名字被无奈地抹去了。

事过境迁，如今院领导实事求是，襟怀坦白，尊重人才，公正善待，着实是让人感受到社会进步之大！

遗憾的是，院领导对刘品的公正评价，来得晚了一些，刘品本人永远听不到了。我们习惯于“盖棺定论”，入棺之前的好人，往往难得公正评价。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

刘品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文革”之前那一段时间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党支部书记。区别于一般政工干部的是，他是一位长笛演奏家、教育家，俗话说是一位“内行”。那个年代的中国，“外行”领导“内行”十分普遍。按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艺术教育单位，党组织应该承担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任务，为艺术教学健康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在刘品担任管弦系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孟波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他原本就是一位优秀的资深作曲家，曾与冼星海、麦新同道。他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创作的《牺牲到最后一关头》及《高举革命大旗》等歌曲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孟波与刘品作为校党委与系党支部上下级的两个书记，承担共同使命，~~引导~~、扶持还在学生时

代的何占豪与陈钢创作《梁祝》，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与校党委跟学生之间的关系相比，系党支部与学生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是刘品，在一个周末的学生音乐会上，发现何占豪的琴弦上响起民乐作品《喜相逢》的旋律。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民族的作品，被绝大部分师生视为“异类”，刘品却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当夜便赶到学生宿舍，对何占豪实际上还幼稚的艺术行为给予热情肯定，启发何占豪为创作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乐而努力。

是刘品，循循善诱，把管弦系与何占豪同班的同学丁芷诺、俞丽拿、沈西蒂等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将何占豪个人的探索扩容为一个年轻团队的集体努力。

是刘品，把管弦系一批年轻学生向民族化进军的壮举汇报给校党委，孟波给力支持，明确要求管弦系拿出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乐，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是刘品，及时向这批奋发的学子传递校党委的号召。“民族化实验小组”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创作，曾初拟三个选题：大炼钢铁、女民兵、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乐基础上发展。孟波选择了第三个选题。当刘品向“民族化实验小组”传达校党委的意见时，何占豪打退堂鼓了，他认为自己内存的越剧音乐素材就这么一点，构不成一部交响乐。

是刘品，耐心启发，帮助何占豪树立信心。

然而，何占豪毕竟没有学过作曲。又是刘品，向领导提议，请作曲系同学参与“民族化实验小组”的艺术探索，这样就有了陈钢的加盟。其间，刘品还联系院内专家、教授帮助两个学生的作品日趋完善、提高，终于在1959年5月27日晚上，在上海市音乐舞蹈汇演的舞台上一鸣惊人，成就一部中华民族的传世之作。

纵观《梁祝》形成的全过程，刘品是这个作品的总策划，孟波是这部作品的总监制，两位都功不可没。

我们常说艺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此话容易使人误解。民族的艺术必须运用世界的通行语言才能是“世界的”。《梁祝》的成功在于，民族民间的艺术，运用西方交响乐的艺术形式赋予了新的生命，才为世界所接受。舆论称其为“中华民族的交响乐”，是对这部作品成功经验的深刻提炼。

当历经半世纪沧桑之后，回头看看《梁祝》的诞生过程，不禁为两位作者感到幸运，同时也不禁对孟波与刘品两位党组织的书记肃然起敬。

值得注意的是，刘品当初为何对何占豪独特的幼稚的艺术表达如此敏锐？对一个学子不自觉迸发的、可能稍纵即逝的艺术倾向抓住不放，进而“推波助澜”，“言必信，行必果”，最终铸成传世之作？

刘品在《梁祝》从酝酿到成功的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及时向校党委汇报，孟波都有鲜明的倡导与指点，上下两级党组织默契配合，形成合力，推进《梁祝》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其间，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到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在观看了“民族化实验小组”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音乐改编的弦乐四重奏（后被称为“小《梁祝》”）时，兴奋地指出：“这是一条路子，要坚持走下去！”

毛泽东的宏韬大略

为什么孟波与刘品这么同气相求，高度一致？国家最高文化管理部门的领导还在《梁祝》雏形时便寄予热望？

这决不是他们几位的个人文化趣味相投，也不是因为“私交”情感因素而异口同声，而是各级党组织忠实践执行建国初期党制定的文艺发展战略，服从于一个共同目标的忠于职守，齐心协力。

当新中国从解放战争的废墟上崛起的时候，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以伟人的气魄，代表全党自豪预言中华民族必将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为此，在经济建设全面恢复的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1956年，文化部与中国音协联合主办了“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来自23个省、市、地区和18个民族的4500名代表聚集首都，从8月1日开始，历时24天，共演出41台、94场、1066个节目。上海音乐学院的贺绿汀、丁善德、周小燕、卫仲乐、吴乐懿等，上海戏曲界的丁是娥、吕瑞英、徐丽仙等，都参加了音乐周活动。贺绿汀任音乐周组委会副主任，孟波任组委会秘书长。当时，他是中国音协的秘书长。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群贤毕至，莺歌燕舞，呈现了新中国文化全面复苏、迅捷发展的动人态势。

在这个音乐周结束的当天，1956年8月24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同音乐工作者亲切交谈。这次谈话，毛主席系统阐述了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并明确提出要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作品。他说：“地球上27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是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毛主席在谈到音乐创作的时候说：“音乐可以采用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特殊的风格，独树一帜。”

毛主席认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

在谈到艺术形式的时候，毛主席说：“艺术离不开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文化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可以保守几千年。”他对艺术民族化的必然性作出了科学的分析。

在这次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结束时，毛主席再次语重心长地寄语中国音乐界：“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至今读来依然觉得亲切，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

义。这篇谈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确立的中国文化艺术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文艺界各级领导的重要思想指南。

由此看来，在“全国第一届音乐周”之后不到三年，就诞生了被誉为“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乐”的《梁祝》，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党的文化科学发展战略哺育的艺术硕果，绝不是某个个人的先见之明。

《梁祝》之所以出自上海音乐学院也绝非偶然，除了具有国际水准的艺术教育环境以外，院领导集体中大多数都是“全国第一届音乐周”的参加者，对那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感同身受，为《梁祝》的诞生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文化环境。

也由此可见，刘品慧眼识才，敏锐发现何占豪，并一鼓作气，抓队伍，抓成果；孟波为学子指点迷津，正确引导；文化部钱部长临阵鼓励，都是在落实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谈话的精神，表现出贯彻党的文化发展战略，“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的高度自觉。

血缘里的本能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党支部，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中最基层的一个书记，刘品出身东北农村，青少年时代从军，转战南北，与工农大众保持着血肉联系。这样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懂得广大民众的审美习惯与文化要求。因此，对于建国初期党中央提出的要求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作品，正符合他内在的欲望。作为一个经受过部队大熔炉锤炼的战士，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使他具备忠实执行党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精神文化条件。

刘品，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忠诚赤子。

刘品，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导师。

今天，像刘品这样忠诚的共产党员，像刘品这样具有战略意识、大



▲ 1949年1月，刘品（在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卡车后第三辆车上）跟随北平和平解放部队进城

局观念、组织能力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人，像刘品这样精心扶持别人而自己淡泊名利的艺术生产组织者太少了！

这就是在刘品逝世三周年之后，编撰这本《化蝶》的意义所在。在这本书里，除了何占豪，几位当年参与《梁祝》创作探索的学子以自描的笔触，描述了刘品对《梁祝》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这个贡献，不仅是对这部作品的“哺育”与“催生”，还有影响这些艺术探索者一生的精神品格的示范与熏陶。在这些内容中，有不少关于《梁祝》首次披露的轶事，为《梁祝》的研究学者提供了不少毋庸置疑的历史考证。作为一位出色的长笛演奏家、教育家，刘品几十年里培育了一批艺术新人，这是刘品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又一重大历史贡献。许多长笛演奏家在这本书里追忆接受刘品艺术与人格教育的片段，是那样可歌可泣。此外，上海音乐学院一批刘品的同事，点滴回忆，展现出一位音乐教育家敬业的精神风采。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刘品在上音学习期间就演奏了巴赫的作品，并由中国唱片公司为他录制了专题唱片。一个音乐家同时具有如此卓越的组织天才和纯粹人格，确实难能可贵。

有人称，读巴赫的作品犹如从阳光下走进一座教堂，由于明暗光照反差造成瞬间失明，先是双目一片茫然，然后，移步向前，步步深入，教堂在你眼前愈发绚丽、辉煌、深邃，无穷无尽。这就是刘品精神世界的写照。

本书之所以取名为《化蝶》，不仅是因为刘品对于《梁祝》协奏曲的重要贡献，更是因为他将毕生心血播撒在音乐教育事业的园地上，孵化出无数艺术彩蝶，纷飞在绚丽的音乐之林。

这本《化蝶》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出生”全记录，一部传世之作的珍贵档案，同时又是对一位中国音乐教育家的人生评品。

刘品，值得人们记忆，值得人们敬仰，值得人们评品。

因此，在上海大剧院为《梁祝》庆生50周年的辉煌舞台上，何占豪只向孟波鞠一躬，似乎还不够。我觉得，他少鞠了两个躬。

占豪兄啊，你还要向刘品先生鞠一躬，更要向毛泽东先生鞠一躬。

2011年11月18日于上海